

# 前言

李志贤

主编

南洋学会副会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南洋学会，原名“中国南洋学会”，成立于1940年3月，由新马一批南洋研究的中国学者姚楠、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李长傅、韩槐准、关楚璞等创办，是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走过七十载春秋的南洋学会，经历了改组、改名并走向本土化和双语化的历程。1958年8月，当学会由“中国南洋学会”改名为“新加坡南洋学会”时，标志着其立足点及研究方向出现了关键性转变，学会更加基于本土并逐渐走向国际，研究重点也更倾向新马华人史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史地考证、考古资料、文献译述、华侨史料、生物研究、人种探索、民侨采访、语言专号、法律问题、教育论著、文化掌故、报业专史、纪念专栏、资料统计、马华文学、佛教艺术、人口问题、经济探讨、地方信息、书评文艺，价值丰富。

回顾南洋学会70年的历史，曾经有过辉煌，也经历过沉寂，但它在南洋研究抑或东南亚研究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轨迹。截至2010年，学会总共出版了64卷《南洋学报》（中英文），47种“南洋学会丛书”，举办了大大小小各类型的公开讲座及座谈会。南洋学会也因此成为海外华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团体，为东南亚华人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0年，南洋学会为庆祝成立70周年，举办了两项重要的活动，第一项是出版《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为学会70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总结；第二项则是举行“南洋学会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在回顾历史的同时，探讨学会的现状并展望其未来。本书即是研讨会中与会学者在会上发表的论文结集，并以研讨会主题作为书名。

秉承南洋学会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宗旨，研讨会的受邀学者除了来自新马两地外，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其他国家的南洋研究专家。虽然大家的讨论都围绕“南洋学会”这一主体，但又不拘泥于此，他们从不同的选题、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讨了与“南洋学会”息息相关的人、事、物。由于讨论的角度宽广、视角多元，内容相互关联，笔者较难于具体地将它们进行分门别类，只能略从南洋研究与先驱学者；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资料、文献与专题研究三方面将各篇论文作一梳理。

## 一、南洋研究与先驱学者

历史悠久的南洋学会，经历过一系列的变迁。于1940年在新加坡创立“中国南洋学会”的创会学者都具有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南洋的强烈愿望，成立之初的南洋学会也被赋予了这一层使命。然而，二战后，随着中国大陆和新加坡政局的巨大变动，南洋学会开始大量招募本地会员，并吸收西方学者，这也引领学会走向本土化和双语化的道路。1958年，受新马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中国南洋学会”改名为“新加坡南洋学会”，明显地标志着其本土化的新方向，注入新活力，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和困境，发展也受到了限制，渐趋平淡。近年来，在历届理事会的努力下，南洋学会又逐渐恢复了生机。但也面对重要的挑战。颜清湟的《南洋学会与南洋研究：回顾与前瞻》就以宏观的视角探讨南洋学会和《南洋学报》的发展的历史轨迹：从中国的南洋学会到新加坡的南洋学会，到以后可能成为新马和大中华的南洋学会；从一个以中文为主发展到以中英文双语为主的研究机构；从一个以东南亚历史，地理，

经济和民俗研究为主的学术刊物到以东南亚华人研究为焦点的学报。同时，颜文也分析了南洋学会发展的原因，动力和困境；评估它的成就，以及讨论它发展的方向和前景。

在南洋学会的发展历史和南洋研究领域，有一些人物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南洋学会本身就经历了一个从中国的南洋学会到新加坡的南洋学会的转型，因此，在其发展进程中起影响作用的学者既有中国学者也有本地学者，而这正好为我们研究南洋学会的历史及其研究方向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同样，由于这些学者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他们研究的角度及书写方式也会有所差别，这使我们在横向比较的同时，也能从纵向的角度来探讨南洋研究重点的转变。梁元生的《从孖李、两会、二陈，到双王：谈本地与中国的“南洋研究”的轨迹》一文就从比较的视角及代表人物去勾勒过去一个多世纪本地与中国的“南洋研究”的发展轨迹。论文通过比对中国学者与东南亚本地学者的南洋研究，从中见其特色与用心。在此前提下，作者在不同时代选取本地及中国代表各一人，作为论述对象。“二李”即十九世纪晚期的李清辉和李钟珏，“两陈”为陈育崧与陈序经，“双王”则是王赓武与王勤/王日根。前者代表东南亚本地的南洋研究者，后者代表中国研究南洋的学者，其目的是寻求轨迹，而非欲以偏概全。

除了梁文所论及的二李、两陈、双王外，南洋学会发展中起影响作用的代表人物还有韩槐准与姚楠两位，他们都是学会早期的成员，也是南洋研究重要的先驱人物。前者在陶瓷学和植物学方面颇有造诣，其考古论著《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被誉为“中南关系史的重要考证”和“对研究中国南洋交通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后者则为南洋学会的创立者之一，并被推为首任会长。他著、译作三十余种，发表文章一百多篇。苏庆华在《南洋研究先驱人物：以韩槐准和姚楠为例》一文中，将个人所搜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借以褒扬两位体现“文人相重”崇高情谊和终身孜孜于南洋研究之前辈学者。

在南洋研究领域，中国大陆著名的历史学家韩振华也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他在南洋研究领域辛勤耕耘40多年，著述甚丰，共撰写专著5部，



发表论文150余篇。研究范围涉及南洋史地、中国东南亚关系史、南洋华侨史等方面。在韩振华辞世后，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大部分费用，将其遗稿整理修订，编成《韩振华选集》。廖大珂的《韩振华教授与南洋研究》一文就着重介绍了韩振华几十年的研究生涯，突显他对中国大陆的南洋研究及培养南洋研究的人才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除了先驱人物、知名学者外，一些学术机构也与南洋研究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例如中国的暨南大学就是其中之一。暨南大学的前身为清末创建的暨南学堂，在民国成立以后逐步发展成暨南大学，校内教师如著名学者李长傅、刘士木等人都投入南洋研究，参与各种写作或调查，并且陆续出版多种期刊及专书。李盈慧的《中国视野中的南洋观：1945年以前的暨南大学与南洋研究》一文，追述了暨南大学与南洋研究的历史渊源，指出暨南大学的南洋研究反映当时一般中国人对于南洋的想象与理解，也不脱“中国”的视野，从而呈现了中国视野中的南洋观。

## 二、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

随着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南洋研究的方法、理论与实践都在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与南洋研究有着密切关系但又有别于南洋研究的东南亚研究开始产生并发展。“南洋研究”是中国在20世纪初期开始使用的词汇，其真正发展是“中国南洋学会”于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之后。许云樵等南来的中国学人是“南洋研究”的主将，在他们的带领下，学会出版了《南洋学报》，在东南亚世界推广“南洋研究”。二战结束后，虽然“南洋”一词依然普遍，但“东南亚”一词已经出现。1955年南洋大学成立，许云樵成立“南洋研究室”，并于1959年出版《南洋研究》学报，他在“发刊词”中将“东南亚”与“南洋”相提并用，并且认为中国境外的“南洋研究”是中国南洋研究的延续。1962年许氏离开南大，自立“东南亚研究室”，并于1965年创办《东南亚研究学刊》，从此不再用“南洋研究”而用“东南亚研究”。此后，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冷战的结束，东南亚一词作为一个国际地理名词，已经广泛地被东西方学者（包括中国大陆）所接受。只有中国南方的大学机构，

由于历史的渊源，尚可看到“南洋研究”的字样，作为“东南亚”的同义词。同时，用华文写作的新马学者仍使用“南洋研究”，但却赋予它“地方历史”的意义，“融入东南亚与华人研究的范畴”。廖建裕的《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一位新加坡学者的反思》一文探讨了“南洋研究”与“东南亚研究”在中国国内及境外的起源与发展，从而勾画出“南洋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的异同。廖文指出，初期它们代表两种不同的传统与思想意识，如今，“南洋研究”似乎成了历史名词，由“东南亚研究”取代之成为主流。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南洋研究”逐渐被“东南亚研究”所取代并慢慢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南洋”仍然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而“南洋研究”则是对应于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诉求、知识系统或社会历史生态。在《再论南洋研究：历史的观察与方法的反思》一文中，吴小安从历史的观察与方法论的反思两大视角，对南洋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进行了思考。例如，南洋研究在历史发展的大进程中如何发源与兴盛、转向与合流；如何恰如其分地、历史地定位与界定南洋与南洋研究等等。通过对些问题的探讨，作者也向我们展示了南洋研究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早期的“南洋研究”还是现在的“东南亚研究”，都常常纠结于“本土”抑或“中国”的视角。“以中国为中心”或“以东南亚为中心”也是困扰东南亚研究学者多年的问题。安焕然就尝试以东南亚华人研究视角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一问题。《“本土”抑或“中国”：东南亚华人研究视角评析》一文指出，华人研究若仅偏执于“本土”抑或“中国”的视角，虽各有洞见，亦有其“不见”和偏颇之处。事实上，在战后以来东南亚各地的政局和社会剧变下，华人在当地社会的文化扎根历程中，其文化调适已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延伸的问题，还是一个基于本土关怀，对华人传统文化自觉的本土化再建构过程。但是，本土视角观察也不应该受限于国家疆界和地方行政区域边界的切割，成为狭窄的井底之见，甚至沦为“去中国化”的产物。在华人史的研究视角上，“本土”与“中国”其实可以兼容，学者可以把握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回归到世界史的视野，探讨华人文化的传扬与建构的历史脉络和历史情境，及其在跨国越界的社会文化资源网络世界中如何整合、再创



造和交流的情形。对意识形态及概念化的宏大叙述固然要有所警惕，由小观大的区域个案研究亦需有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

### 三、资料、文献与专题研究

在南洋学会及南洋研究的发展历程中，除了身处不同时代、有着不同背景的学人，以及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理论外，丰富的研究资料、历史文献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属于第一手史料的报章，就是南洋研究的资料宝库。一百多年来，新加坡华文报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尽管办报的宗旨不一，但大都以弘扬中华文化、提倡华文教育为宗旨。这些报章资料，成为我们研究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宝贵文献。崔贵强的《新加坡华文报章：新华研究的宝库》一文，就通过列举新华社会早期的各种华文报章，深入分析及归类其内容、风格、立场等，探讨这些报章所呈现的早期新华社会面貌，从而佐证了华文报章是新华研究的宝库，为新华研究提供多方面素材。

学者藏书是南洋研究中另一种珍贵的历史文献，虽然它们不尽然是原始资料，却可以让我们了解早期学者的研究兴趣及研究概况。然而，学者藏书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受学界的关注。在南洋学会的先驱人物中，属许云樵和陈育崧两位学者的藏书最为完整及最具代表性。何奕恺的《南洋先驱史学家藏书研究：以许云樵、陈育崧为中心》一文，探讨了这两位学者藏书的保存过程及现状，分析个别特点，希望能从另一个角度窥视两位学者的治学特点，也尝试从中归纳出南洋先驱史学家的藏书特色及其价值。作者希望能借此唤起学界对于学者、藏书家藏书的关注，能更有意识、更完整地予以保存，以嘉益后学。

在南洋研究的原始资料中，侨批是了解海外华人与祖籍地联系的重要史料。近年来，侨批这一边缘性的史料也开始引发学者们的兴趣。滨下武志的《南洋侨批史：侨汇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就以侨批为切入点，探讨海外华人如何通过侨汇，与祖籍地之间建立起一个金融网络，并如何通过这一网络加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的联系。除了对这一金融网络运作起重要影响的经济因素外，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也是作者考量的重要层面。

在南洋研究领域，有部分学者常年专注于某一专题的研究，并成为该专题的先导学者，后人也在其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钻研。其中，许云樵教授就是中外交通史研究的专家。据廖文辉的《试论许云樵的东西交通史研究》的介绍，许教授的中外交通史研究主要有两个部分，其一为南海古史地名考据，另一为东南亚对外关系的研究。前者的成果有者已为学界肯定，虽然其中有些创新，亦引起争议。但论点基本为学界认同。由于地名考据方法的局限和史料的匮乏，造成这个研究领域疑点多、争论性强，是无可厚非的，不应以此专薄许氏，进而诟病其研究的主观和武断。后者的成果可分为三部分，即暹罗中国关系研究、琉球东南亚关系研究和东南亚中印西方关系研究，前面两部分的研究至今仍有其独特性和填补研究空白的作用。

通过对本论文集各篇章的梳理，可以看到各学者的研究视角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对南洋学会及南洋研究有特定的历史关怀，而大家也借“南洋学会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情怀。这一历史盛会能够顺利圆满的举行，要感谢各界人士及机构的鼎力支持与赞助。当然，我也要代表编委会，感谢南洋学会的各位理事及参与庆典筹备的筹委们，在筹备研讨会和编辑论文集的不同阶段，给予的建议和协助：特别要感谢会长陈荣照教授的提点并拨冗为本书作序。我也要向编委会的同仁和参与编辑本书的其他人员所付出的努力致以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衷心感谢论文集所有作者的支持和谅解。他们在百忙之中拨出宝贵时间参加在新加坡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并为本书严谨的撰写论文，使之能顺利出版，为南洋学会70周年庆典活动划下完美句号。由于编者力所不逮，若有任何疏漏及瑕疵，还请各位方家谅解及指正。虽然本书作者观点并不代表南洋学会和编委会的立场，也不确定能为所有读者接受和认同，但毋庸置疑，本书所有作者都出自对南洋学会及南洋研究的关切之情，以及对其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并秉承丰富及推动学术发展的可贵精神来发表自己的观点。